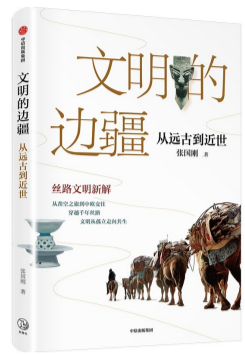


## 《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 一次文化叩问的远征



张波

文明是一场宏大的叙事，时空、人物、故事等千头万绪地熔铸其中，剪不断，理还乱。一本好的文明史著作不仅要求作者有深厚的学养，有能力在浩繁的史料中来一场时空旅行，去触摸和唤醒我们共同的记忆，还要有超出一

般学者的宏观视野，有眼力在历史的人群里找到那个我们都熟悉的人，给读者一种惊喜。《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便是一本关于丝路文明史的难得书籍。春天里，它是文明之路上盛开的一朵绚丽的花儿，努力让花粉粘在像蜜蜂一样勤劳的读书人身上，带向远方，去播撒文明的基因。

本书以丝绸之路为主线，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用翔实史料和全新视角演绎着丝路文明新解读。近代以前，规模尤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东向西、自西往东，是双向互动的。作者张国刚教授以欧亚大陆的辽阔地理时空为视角，用沉浸式文化之旅的方式，叙述着张骞、甘英、玄奘、鸠摩罗什、马可·波罗等文化使者，用执着、智慧、胆识和坚韧的脚步推动着欧亚大陆的文明链接，勾勒出丝绸之路缔造的文明边疆。

翻开书，我们在时空中去寻找解读丝绸之路的中国坐标，作者在这本书中为我们这样的寻觅提供了一枚指南针，那便是“天下”的秩序概念。恰如他在书中所言：“传统中国的历史书写一直有着全球视野。从《史记》的《大宛列传》、《汉书》的《西域传》、《三国志》的《倭人传》，到《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身毒传》、《明史》的《外国传》，从《通典》的《边防典》，到《文献通考》的《四裔考》，都力图把中国放在整个天下秩序中加以定位。”在中国人的天下秩序中，“西方”不仅具有地理的含义，还具有特别的文化意义。沿着“天下”的文化指引，我们在丝绸之路之上会清晰地看到先辈们走过的足迹，更加坚定我们正在走的路，眺望着前行的路。正如作者在文末自豪地说：“中国人如今更需要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更有底气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全球化的中国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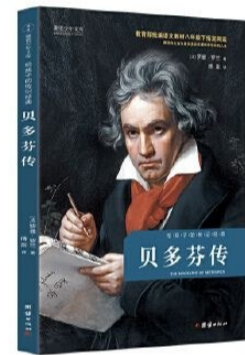
《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用四篇二十章完成了一次文化叩问的远征，每一章都用类似“东汉与罗马：丝路帝国的遥”故事性的主题命名，再用一个个故事编织出丝路文明的人间烟火与风云幻化。这种随心漫游式的章节设计，可以让读者随时翻开一页都可以作为开始，也可以在任何一页结束，有像折页盒一样的阅读体验，所遇皆是惊喜。

阅读这本书，我们大可以像闯进玩具店的孩子，奔跑撒欢，穿梭在琳琅满目的玩具中间，碰到无趣的，转头就走；遇到喜欢的，爱不释手，尽情地玩耍，单纯享受玩耍带来的快乐，不亦乐乎，流连忘返。这样随便翻翻，到处戳戳一样的阅读体验，挺棒的。这个过程中，阅读变成了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文明也悄然间地、真正走进了我们的生命，镌刻在我们的心性之中。这种基于乐趣的好奇心和追求不正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初心吗？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人类对财富与成功的渴

望，以及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野蛮时代诉诸战争，随着文明时代的推进，这种动力机制变得多元而且复杂，战争本身也不完全出于经济或财富目的。”继而，作者在这些好奇心和追求背后提炼出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四种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宏大而又细致的丝路文明叙事。

出于政治、外交需要的国家叙事，为我们讲述了无论陆上的“凿空之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还是海上的“香瓷之路”（宋元时代的南海丝绸之路），都肩负着中原王朝谋求国家安全的丝绸之路战略；经济与财政需求的商业故事，记录了丝绸、瓷器、茶叶等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形塑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丝绸之路的科技叙事，穿越大漠，跨越海洋，人类以善假于物的智慧消弭自然距离，以面对面地交流叩问人类文明的真谛。

## 一个伟大灵魂是如何炼成的 ——罗曼·罗兰《贝多芬传》读后



李立峰

有趣、励志、多维，是我读了《贝多芬传》一书的感受。

这本流传于世的经典，拿到手的第一秒就令我震惊，震惊于它的薄。全书只有205页，而真正称得上贝多芬传记的只有54页！但这依然不影响它成为无法超越的经典，因为这是用泪、血、情写成的，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是如何炼成的。

一位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位家喻户晓的翻译家。这三位巨匠的相遇，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没错！正是这本《贝多芬传》。主人公贝多芬乃乐坛巨擘，世人皆知；作者罗曼·罗兰乃文坛巨匠，闻名于世；翻译家傅雷乃译坛大家，其著述《傅雷家书》影响了无数人。三人联袂奉上的《贝多芬传》，注定就是经典。

特普利兹，是奥地利的一处避暑胜地。这里风景优美，各国亲王贵族云集。它引人注目，更在于1812年，贝多芬在此写出了《第七交响曲》《第八交响曲》，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谈谐的交响曲。

《第七交响曲》背后，说个有趣的故事。一日，贝多芬和好友歌德在林荫小道上散步时，远远看见奥地利王室成员和近臣欢呼后拥走过来。歌德见状，马上挣脱贝多芬的手，肃立在大路一旁，深弯着腰向王室成员致敬。这让贝多芬很不爽，也很不屑。他既没有脱帽，也没有让路，而是背着手，朝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众人向他脱帽致敬，皇后向他打招呼，他赚了面子。等众人走过，他来到歌德面前，大大地教训了歌德一顿。

如果说不畏权势、不惧权贵，是贝多芬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体现，那么，不珍视友谊、不懂分寸，则让他失去了知己，拥抱无尽的孤独。任性的脾气，骄傲地反抗，投射在人情世故上，无疑是致命的，但倾泻到音乐里，则掀起了惊涛骇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少年丧母，青年耳聋，中年情变，晚年无依。这就是贝多芬的一生。书中这样写道：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之人，定能因之而担当苦难。”

这是一位音乐家的呐喊，也是一个音乐巨人的使命！

这个表面狂傲的人，内心却极度高尚。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厄运，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奉献给他一样“可怜的人”“将来的人”，为他们造福，给他们勇气。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受苦、奋斗、为善，成为锤炼贝多芬的洪炉。他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接受了现实，承受了上天给予他的痛苦命运，他把内心的痛苦化为欢快的音符，创造欢乐给予世界。

贝多芬的一生，正如他自己写的那句豪言壮语——“用痛苦换来欢乐。”这句话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

“使人幸福的是德行而非金钱。”  
“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真理。”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越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

励志，是这本书传世的密码。这些摘自贝多芬的遗嘱或书信。

在这本传记中，罗曼·罗兰将贝多芬的遗嘱、书信细心整理、收入其中，难能可贵。这让读者有了更多元、更立体、更直观的视角，去解读贝多芬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去了解一个伟大灵魂是如何炼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还是档案，是史料。

贝多芬表面上不畏权势、不媚王公，内心则心怀高尚、心生慈悲，是一个大爱之人。被爱情遗弃了，他依然选择热爱爱情——“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得一样的剧烈。”

被命运嘲弄了，他依然选择热爱自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被疾病虐待了，他依然选择痴迷艺术，“只在音符中过生活；一件作品完成，另一件又已开始了。”“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贝多芬选择在爱情中实现了自愈，在自然中汲取了灵感，在音乐中实现了永生。他把自己毕生献给了艺术，建构了一个丰茂广阔的精神家园，引领着无数人走出苦难，拥抱欢乐。在人世间行走57年，他留下一百余首音乐经典。贝多芬对后人的影响，显然已经不局限于音乐，而是他的人格，他的思想。

“童年的伴侣，心目中的英雄，给予坚强与纯洁的首席，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这是罗曼·罗兰心中的贝多芬。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这是傅雷心中的贝多芬。

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是成功的基石。可以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都是用心用情在书写这本书。翻译这本书，才写出了这样直击人心、触动灵魂、发人深省的文字。

感情深沉，诗意流淌，却字字珠玑，惜字如金。这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大书。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 【对话作者】

## 长篇小说《惊蛰》作者杜阳林： 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本报记者 刘一叶

惊蛰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雷声轰鸣，叩醒万物，预示春归大地，人间青葱。作家杜阳林以一部长篇小说《惊蛰》，在今年“4·23世界读书日”前夕，与余华、莫言、刘震云、梁晓声等人一同入选了第八届当作家影响力评选的“小说作家”榜单（共20位）。

就在不久前，浙江文艺出版社宣布了《惊蛰》即将开始新一轮加印，这也是该书自去年7月出版以来第8次加印。

小说《惊蛰》通过主人公凌云青的个人奋斗故事，透视了一批以凌云青为代表的乡村青年走向城市的奋斗经历。杜阳林在书写这一故事时，没有选择诗化柔美的乡村叙事，他以冷静的笔触，穿透重重迷雾，打捞岁月深处的观龙村，并以清醒克制的笔调，勾勒出人们艰苦生存的真实境遇。

早年的杜阳林是一位媒体工作者，先后在《十月》《收获》《中国作家》《四川文学》《青年作家》等文学期刊上发表文章。近几年，杜阳林深耕于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步步为营》《长风破浪渡沧海》等小说和散文集。“写作本身是艰苦的，但这艰苦中又蕴藏着世间纯粹的幸福和愉悦，我正是在这偶尔一现的快乐中，追寻写作的价值和意义。”重拾文学创作的他，坦承找到了新的快乐方式。

那么，《惊蛰》所蕴含的自然人文气息，是如何引发作家杜阳林创作灵感的？一部乡土题材的纯文学作品为何受到读者的热捧？近日，杜阳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道出了他的写作历程。

重庆日报：《惊蛰》上市7个月就已加印了7次，在你看来，这部作品畅销的原因是什么？当下年轻人是否能从阅读中受益？

杜阳林：《惊蛰》能够加印7次，这是读者朋友们对这本书的厚爱，也是对我这样的写作者的肯定。我承认，今天的文学氛围，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那时，我的同学们几乎都以“能写两笔”为荣，热爱书籍、热爱阅读是那个时代的共同底色。到了今天，人们的精神享受方式已各不相同，但我相信，书籍的形式无论经历何种演变，人们对于文学之美、艺术之美的感知和享受，都不会泯灭。正因为抱着这样的执念去书写、去求索，我带着纯粹的心愿，在文字之中种植信念和梦想，最后赢得了读者真心地认同，这让我感到欣慰。

《惊蛰》是一部励志小说，但又不仅仅是励志作品。这话有点绕，但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凌云青成长的10年，一路坎坷一路坚守，在这个少年身上，读者能很清晰地触摸到奋斗的力量。这种力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人们需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励志小说。可凌云青从一个山村少年，到有机会走上绿皮火车，去外地求学，走向新的未来。他走出来的背后因素有很多，除了个人的自强不息，还得益于他身边那些人性微光的照耀，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撑，有了这些，年轻人的学习和奋斗才有了出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更偏重于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以一个人、一群人和一一代人的命运之变，揭示时代发展的铿锵足印。

重庆日报：当代写乡村的作家有很多，这并不是一个讨巧的题材。为何会从这个题材入手来创作？

杜阳林：书写乡村题材的作家有很多，在我看来反而是好事，这说明人们重视乡村，或者说，很多早年有过乡村生活印迹，如今已定居城市的作家，他们思念乡村、怀想乡村、赞美乡村。他们其中不管是书写过往的田园牧歌，还是如今的乡村振兴，都是源于对乡村一份真挚的热爱。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大，再加之户籍改革，有人哀叹“牧歌不再”，有人

庆幸“胜利进城”，思维的多元纷呈造就了当今乡村文化的斑驳杂芜，与过往传统乡村文明已有了很大差别。我在书写《惊蛰》时，把故事背景放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因为我感兴趣的是，这时的中国乡村，经历了旧与新的激烈碰撞，对于生活其中的人，会造成怎样的思想震动与行为改变？而写作本身就是一次解困的旅程，从这个题材入手，让思想从现在回到过去，又从过去跨到现在，许多不清晰的想法，如同底片浸泡于显影液中，思维也在文字中一点点显现，这让我激动。

一个写作者从什么题材入手，也许不能泛泛地看这个题材是否“最近受到人们关注，将来书籍投放市场是否有卖点”，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内心。正是在我心中翻腾的感悟与激情，在我思维中不断沉淀并有深刻的结晶，让我义无反顾，选择了这样一个乡村题材来郑重书写。

重庆日报：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凌云青离开了乡村。乡村不再有凌云青，乡村怎么办？你希望当下的青年和乡村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杜阳林：凌云青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新兴代表，在小说结束时打起行囊离开了观龙村，这对于凌云青而言是合乎逻辑的一件事——他只有真正走出乡村，才能在未来“回到”乡村。这话似乎又有点绕，但仔细想想，如果沈从文一辈子都待在湘西，鲁迅从未离开过鲁镇，他们还会在文学作品中，留下让读者如此印象深刻的湘西和鲁镇吗？家乡的意义，很多时候都是在离开一段距离之后，有了空间和时间的相隔，反而能让自己冷静下来，深刻沉思，用相对客观且理性的视角丈量出更加真实的家乡。所以我并不担心，凌云青们的出走，是一场彻底的逃逸与消失。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有朝一日，他们会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和赤子之心，再度回馈乡村，反哺乡村。

说到当下的青年和乡村的关系，有一天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深以为然：“我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帮大家摆脱贫困，而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我想，这句话说出了我自己的心声，也说出了我对当代乡村青年的期待。

### 我的书架 我的书



文/图 本报记者 刘一叶

听到“笔耕村”，你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一个田园村落。对于作家王雨来说，“笔耕村”是他尽情挥洒文学灵感的舞台，是他家中的书房。

从房间到客厅，王雨的书无处不在。可以说，整个家都是他的书房。进门向右望，是王雨在客厅的书柜，文史哲各类型书籍满满当当，塞满了一面墙。多年来，王雨一直在文学和医学两个不同领域驰骋。在文学界，他

曾有多部作品入围茅盾文学奖提名；在医疗界，他是蜚声业内的超声医学教授、博导王志刚（王雨本名）。“书已经塞满家里每一个角落，有部分医学类的书籍还放在我的办公室。大致算算，上千本应该是有的。”凡是出版社、朋友寄来的书籍、期刊、杂志，王雨在翻阅之后，总会做上标记收入他的书柜。

记者走进“笔耕村”，两面墙摆满了3个书架，“这排书架有些年头了，最上面是一些颇有年代的连环画，大部头著作等，往下是一些文学期刊杂志。”王雨笑称自己的书都是随意摆放，没有特别分门别类。两面书架中间是书桌，笔耕写作处，放了一台电脑和几本书，其中一本是他最近正在阅读的《人世间》，作家梁晓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对我来说，阅读是一种休憩，是充电，也是补课，医学知识吧，日新月异，必须不断学习，才能了解掌握新的知识。”他说。

王雨阅读的开端，和儿时的煤油灯有着紧密的联系。“青少年时，我和朋友相互借阅一些名著，像《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高中时开始写诗的王雨坦言，“煤油灯，陪伴我读书。那时候，我读书真的是如饥似渴。当时能够看到的文学书籍非常稀缺，买到或是借到一本书，就一口气读完。”

当他谈及如何转换医生和作家的身份时，王雨畅怀一笑，反问记者：“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件事？喜欢到打碎你，你都要去做？”于他而言，写作就是如此。“医学是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主业，文学却是可以让我清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写作的动力。”

王雨说，挤出时间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空闲时间都写不够才是大问题。“我没有跨出自身的生活认知去写任何东西，都是写我熟悉的领域。”于是，王雨以幼儿园当老师的母亲为原型，写了短篇小说《桂阿姨》；以驾驶员父亲为原型，写了《车神》；详细了解重庆通史后写下了他的重庆移民三部曲《填四川》《开埠》《碑》……“写作是兴趣，即便成就斐然，王雨也并未影响本职工作。相反，在爱好的促进下，他在文学领域也拥有了与医学并驾齐驱的成果，“从事医学工作和文学创作，是我个人在精神和体能上一种妙不可言的交替休息。”王雨说。